

# 族群、性別與階級： 再探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

陳婉琪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

外省與本省族群間在平均教育成就上有相當顯著的差異。既有文獻，一方面對於外省族群身分之於教育取得是否有其獨立影響並沒有一致的答案，另一方面，大多假設族群效應為一定值，較少考慮到此影響力在不同群體身上是否有所差異。本文合併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多期資料來探究族群身分對於上大學機會是否有獨立影響力，分析其長期趨勢，並檢測省籍、性別、父親教育程度之間的交互作用。本文的主要發現有二：首先，對出生於 1940、1950 年代的年長世代來說，外省族群中上大學機會的兩性差距要比本省族群來得小。再者，在控制父母親教育程度、城鄉差距、父親職業地位之後，省籍效應同時依父親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變化；對高教育家庭背景的子代來說，並沒有統計證據顯示，省籍對於任何出生世代之上大學機會有影響；但在低教育家庭背景的子代中，則存在相當顯著的省籍效應——外省族群身份對一個人上大學的機會確有影響，對出生於 1940、1950 年代的年長世代來說尤為顯著，在進一步控制公部門效應與手足數之後仍有影響；不過，此效應已隨時間推移而減弱，甚或消失。整體來說，族群身份對於教育成就的影響，與其所鑲嵌之社會脈絡息息相關，不僅依時代變遷，也因性別及階級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關鍵詞：省籍、族群、性別、階級、教育成就

## Ethnicity, Gender and Class: Ethnic Difference in Taiwa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Revisited

Wan-chi Chen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gap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etween mainlander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especially in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Existing studies did not provide consistent answers about whether ethnicity has an effect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net of parents' education a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Focusing on the probability of obtaining a bachelor degree,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mainlander effect varies not only with birth cohort but also with gender and class. The findings include: first, mainlander effect wa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among females than among males in the early years due to greater gender egalitarianism within the mainlander group. Second, whereas no ethnicity effect was observed among those from highly-educated families, the probability of attending college for mainlander offspring from less-educated famili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or other ethnic groups, even after further controlling for the "public sector" effect and the number of siblings. Ethnic difference in gender egalitarianism accounts for the early-year net effect to some degre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features left unexplained. Possible explanations to be explored include: language capital, social capital formed within mainlander villages, and new immigrants' atypical motivations.

*Keywords: ethnic group, gender, clas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 一、前言

台灣本土關於教育階層化這個領域的研究，從九〇年代初期蔡淑鈴、瞿海源連續發表數篇重要基礎研究開始，即已確立省籍這個變項的重要性。多數學者同意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之間在平均教育成就上有著顯著的差異（Tsai and Chiu 1993；吳乃德 1997；Wang 2001；駱明慶 2001），但是多數的研究顯示，教育成就之省籍差異乃透過社會經濟的運作機制——亦即影響教育成就最為關鍵的幾個家庭背景因素，例如父母親教育程度、家庭社經背景、城鄉差距、公部門效應等所造成。這樣的結果與論點表示：族群身分本身對於一個人的學歷取得並不具有獨立的影響力。然而，有趣的是，也有許多研究者，於一般家庭社經背景因素之外，提出各種關於教育成就之省籍差異的解釋，例如語言資本的影響、移民處境等等，認為省籍的獨立效應確實存在。

存在或不存在，究竟族群身分的獨立效應指的是什麼？如果在相同家庭社經背景條件下，<sup>1</sup> 族群與教育取得之結果沒有相關性，那麼我們可以說族群身分並不具有獨立效應，只是透過某些家庭背景之條件差距而造成教育成就的差距而已。相對地，在一般家庭社經背景條件之外的、附屬於某族群（甚或在某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特質（包括語言、文化、價值觀、受到處境所影響的心態，乃至獨特歷史時空所造成的特殊性等等），如果與教育取得過程有某種程度的關連，且對結果造成影響，那麼我們可以說某族群身分對於教育取得具有獨立的影響力。美國的亞裔子女顯著高於其他族群之平均教育成就，可以說是族群身分具有獨立效應比較明確的例子之一。此獨立效應在統計上則以族群變項之淨效應來推估，亦即在儘量控制所有可得的、同時與

---

1 意指控制了相關文獻所公認影響教育取得過程與結果的基本家庭背景因素，包括父母親教育程度、城鄉差距、家庭社經背景；也就是說，與「資源分配」有關的具體因素，又如家庭內部手足之間的資源分配、因職業性質有所不同的時間資源分配、工作穩定度等。

教育取得以及族群這兩者相關的家庭背景因素的情況之下，所得到的族群效應。

然而，筆者也必須承認，就影響教育成就的因素群來說，「一般家庭背景因素／族群特質」這樣的二分，在經驗世界裡仍有著某種程度的曖昧性，兩者中間地帶不乏模糊之處，充其量只能說前者與資源分配、教育取得有著具體而直接的相關性，而後者，如果不是使兩者相關的運作機制較為間接，也可能只是因為該因素具有某種程度的特殊性（例如美國的越南移民社區），等待研究者去區辨、釐清。不過，這些間接關連與特殊性，也正是有趣的地方：除了一般家庭背景因素之外，究竟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一個人教育取得的過程與結果？換句話說，透過辨識教育取得之族群獨立效應，不僅可以讓我們更了解一個社會的族群關係 這個單一面向，事實上還可以增進對教育取得過程的了解。

回到台灣的教育取得省籍差異，追隨既有文獻所累積的研究成果，以及面對其不一致看法，於是我們要問，獨立於一般家庭背景因素的外省族群效應真的存在嗎？如果不存在，那麼將省籍或族群此變項納入分析就沒有太大的必要性，只要涵蓋充分的一般社經背景條件即可完整解釋教育取得的省籍差異。如果存在，又存在於何時何地？是否隨著時間而有改變？是全面性的存在於該族群當中，還是只存在於哪些次群體？如果存在，既有文獻提出的種種看法，足夠解釋此獨立效應嗎？

正如同有實證研究者指出「觀察樣本數量在趨勢分析中的重要性……很多時候『沒有趨勢變化』的結論只是由於不足夠的統計解釋力」（de Graaf and Ganzeboom 1993: 98-9），類似地，不足夠的樣本數量也較難檢測出母群體中少數族群可能具有的效應，遑論族群中的次群體。本文即將環繞著省籍效應這個主題，嘗試以較大的樣本數來探究這個問題。透過折組與次群組比較分析，較大的樣本數更具有檢驗出趨勢變化，以及變項之間交互作用的潛力，使我們能夠更深入而細緻地探究現象。

## 二、文獻探討

### (一) 國外文獻：解釋教育成就之族群差異

雖說多數國家或多或少都有不同族群的存在、族群之間各方面的差異，乃至族群間資源分配不平等之問題，但美國——因其長期、豐富的移民發展史而逐漸成爲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可說在「教育成就之族群差異」這個主題上累積了特別豐富且精彩的論辯與多元觀點。一般來說，解釋不同族群間的教育成就差異，最基本的分析始於比較其影響教育成就（不論是學業成績或是升學傾向）最重要的家庭背景因素，也就是父母親的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社經地位。一旦控制了父母親教育程度與家庭社經地位之後，不同族群之間若沒有顯著差異，那麼我們可以說族群間表面上的教育成就差異，事實上只是家庭背景、平均社經地位之差異所造成的結果：弱勢族群並沒有被剝奪平等的教育機會。換句話說，族群本身並不足以成爲一個重要的解釋變項。美國來自中南美洲的移民後代(Hispanics)即是一例：研究顯示，家庭背景因素（平均來說低於其他族群的父母親教育程度與社經地位）幾乎解釋了「美國西語裔學生顯著較差的教育成就」此現象的絕大部分差異(Warren 1996; Kao and Thompson 2003)。

然而，真正引人注目的現象卻在於控制了家庭背景因素之後仍然存在的顯著族群差異，也就是族群本身的「淨效應」。要如何解釋族群對於教育成就的淨效應？相同的背景條件下，何以有些族群的平均教育成就較差？族群本身真的是教育機會不平等其中的一個重要變項？但又要如何解釋另外有些族群突破語言與文化融入等重重障礙，甚至展現了優於主流群體的教育成就？在美國這個在在強調機會平等的社會脈絡裡，這些問題成爲各領域研究者積極探討深究的焦點。

訴諸於歷史與社會的長期角度，藉著區分各少數族群「進入」主流社會之途徑的不同性質，人類學家 John Ogbu (1987)提出一個解釋架構，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將「非自願性的少數族群」(involun-

tary minorities) (最典型的代表可說是黑人與北美原住民) 這個類屬分離出來，以區別於另一類基於自由意志選擇前來美國新夢土尋找更佳發展機會的「自願性移民的少數族群」(immigrant minorities)。Ogbu 強調，前者（不論是被殖民者征服或是被迫嵌入奴隸制度）的「非自願」屬性，使得他們自始便被發派至社會中最低賤的位置，長期以來被拒於主流優勢族群的社會與文化之外；在這樣的歷史社會脈絡中，在絕大多數情況可說是負面惡性循環的長期族群互動之下，非自願性少數族群發展出反抗主流社會的文化與專屬我群的社會認同，用以與他群（優勢群體）做區隔；對於主流價值觀以及（宣稱倡議機會平等的）學校教育體系之不信任，則是這種反抗心態衍生出來的症狀；在教育成就上負面的「族群淨效應」則是其中一種結果。相對地，「自願性移民」這類族群抱持著主動追求更佳發展機會的樂觀心態，所拿來比較的參照群體是家鄉國家的同儕，也因而不那麼在意自己當下所處於新社會的結構位置。這種深信新環境提供了更好的機會的樂觀心態，導致這類族群對於學校教育體系抱持著截然不同的觀感——相信教育可成為改善處境、階級晉升的重要階梯，教育是對子女最佳的投資；在教育成就上正面的「族群淨效應」則是我們所觀察到的結果。

整體來說，對於美國非裔學生的「負族群淨效應」以及亞裔學生的「正淨效應」這兩種特別符合前述分類的典型族群，Ogbu 的解釋架構固然有著強而有力的吸引力，但其解釋力也並非所向披靡。即有個案研究描繪了與上述理論相衝突的案例：在相似的低社經地位條件下，非裔學生卻比白人學生有著更高的成就動機(MacLeod 1987)。此外，如同 Grace Kao and Jennifer S. Thompson (2003)所指出的模糊類屬——因種種政治因素而逃難至新國家求生存的難民(refugees)，有著不得不然的非自願性，卻又有著逃離母國的主動性，也同時歷經了移民過程的自我篩選(self-selection)，該如何歸類？

另一個解釋教育成就之族群差異的重要觀點則訴諸於文化。Henry T. Trueba (1988)批評 Ogbu 的歷史結構決定論傾向，援引心理學與人類學文獻，指出文化在知識取得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也因此

強調在探討教育取得的族群差異時，不能不考慮文化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什麼作用。面對亞裔學生在教育成就上普遍的傑出表現，九〇年代的文獻多所探討，文化取向的解釋更是佔了其中大多數(Kao and Thompson 2003)。Barbara Schneider and Yongsook Lee (1990)即指出東亞裔學生顯著較高的學業成績，關鍵在於東亞文化裡極度重視教育、紀律與勤勉美德的價值觀；這樣的文化觀不僅由學生、家長與同儕所共同抱持，而且反映在子女的學習成就動機、父母的期望，以及具體行為上，例如家庭內的學習活動或同儕之間的互助學習。

另有一些研究者指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對於特定族群的重要性。例如 Min Zhou 與 Carl L. Bankston III (1994, 1997)研究越南移民族群，發現青少年成員對族群家庭文化觀越有認同感，或是參與族群社區之社會連帶越深，也會展現越高的教育成就（包括學業成績與升學意願），甚至高於類似社經背景之白人同儕。他們認為解釋移民族群適應過程的傳統同化理論(assimilation theory)對此類案例是不適用的；透過保留傳統文化價值觀以及維繫族群成員間的緊密連帶，越南移民將族群認同感與文化觀轉化為實際的社會資本，包括族群成員之間的互助支持，以及價值觀的強化。<sup>2</sup> 這種學業成績、強烈成就動機與族群認同、族群團體之參與度兩者之間的正相關，也在其他移民族群當中被發現（Zhou (1997)的文章做了極佳的文獻回顧）。

關於族群與教育成就之間的關係，另一個較新的解釋論述則強調移民的「代」數。一些實證研究指出，控制家庭社經背景及族群之後，第一代及第二代移民，相較於第三代（或以上），有著更高的學業成績、成就動機與教育成就(Kao and Tienda 1995; Fuligni 1997)。這種現象大部分被解釋為新移民的樂觀主義，移民到新國家這件事被視為全新機會的開展，不論是父母親或子女，都抱持著強烈的成就動

---

2 此個案與 Coleman 所關注的美國天主教學校——其學生之所以有較佳的學業表現以及低輟學率，關鍵在於社區成員間緊密的社會連帶以及被強化的共同價值觀——極為相似(Coleman and Hoffer 1987)；而此類學校所展現的社區文化與成員互動，正是 Coleman 發展其「社會資本」之概念重要的實證基礎。

機，展現在態度上成爲重視教育的價值觀，展現在行爲上則是同儕之間的互助學習。

總括來說，受到移民文獻中的新典範「多元」族群觀點，以及從傳統同化理論修正而來的新概念「差異同化」(segmented assimilation) (Portes and Zhou 1993) 之影響，「族群展現何種『結果』？族群身分本身是否展現顯著『淨效應』？不同族群間爲何有所差異？」等這些問題，不再被認爲可以得到單一、固定的答案。特定族群被鑲嵌在／進大環境中的哪個「部分」(segment)，屬於什麼樣的階層，進駐什麼樣的社區等等，都與族群效應本身有著極爲複雜的互動關係(Zhou 1997; Kao and Thompson 2003)。對中高社經地位家庭之子女而言，與主流社會同化也許是較佳的策略。對低社經家庭背景的青少年而言，有些族群以抗拒同化、努力保留獨特文化價值觀、維繫族群向心力等策略來求生存，有時確實能夠展現向上爬升的驚人力量；但有些族群以抗拒主流價值、排斥學校教育、形塑我群認同等等策略來滿足社會心理層面的需求，卻可能導致長期被排拒在優勢階層門外。不過，在這裡最重要的是，這批文獻探討可以提供我們幾個有用的參照面向：第一、族群效應經常與階級、社區環境型態有著極爲複雜的互動關係，使得特定族群之淨效應很可能因階級與居住地區性質而有所差異；第二、移民族群很可能展現某種特殊性，倘若這項特殊性的確是伴隨著移民處境而來，那麼亦將隨著時間推移與處境改變而有所變化。

## (二) 台灣本土文獻：教育成就之省籍效應

上述國外文獻探討著重美國的族群差異與研究，然而實際上，台灣不僅與美國的情形有著相當大的差異，跟很多其他社會國家相較，也算十分特殊。台灣的外省族群，與人數最多的閩南族群相較之下，雖爲少數族群，然而在戰後的台灣（尤指戰後到解嚴前這段時間），不僅在政治上爲主導族群，在「推行國語運動」以及「復興中華文化」的民族主義目標與口號之下，在文化上亦屬優勢族群（王甫昌

2003)。在經濟上，由於台灣於短短數十年間歷經了快速的經濟發展，加上族群與階級之間的複雜交錯，何者佔據著優勢／弱勢的結構位置，則未必有定論。一般來說，針對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幾乎所有研究者都共同認為，外省與本省族群之間平均父母親教育程度的差異，是最重要的解釋原因。此外，由於外省族群與閩、客族群遷移來台的歷史條件不同，也使得居住地區以及族群行業分布結構這兩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外省族群大多聚居都市地區，而且在農林漁牧礦業和製造業中的比例遠低於其人口比；另一方面，外省族群特別集中於公家機關與公營企業的現象，也是省籍職業差異中最為人熟知的面向（林忠正、林鶴玲 1993）。本文所環繞的問題意識在於：當我們同時考慮到這幾個與教育取得息息相關的重要面向上的族群差異，外省族群在教育成就上究竟有沒有「淨效應」存在？研究者們並沒有一致的答案。以下針對本土研究做一番文獻回顧。

九〇年代初期，蔡淑鈴與瞿海源連續發表數篇關於台灣教育階層化及其長期趨勢的重要基礎研究，其中一篇並被收錄進 Yossi Shavit and Hans-Peter Blossfeld (1993) 的大型跨國比較研究專書中 (Tsai and Chiu 1993)。除了最重要的解釋變項父母親教育程度外，研究者亦控制了父親職業與居住地區。然而受到樣本的限制（樣本數不到一千，又必須切割區分成三個世代），教育取得的省籍效應並不顯著。但在區分各個升學階段的分級分析中，研究者則指出越是初級的升學階段（小學畢業或國中畢業），外省族群繼續升學的機會優勢（相對於本省族群）越明顯。在另一份分析中，研究者則進一步指出，在升學過程的中段（國中畢業與高中畢業），外省子女的確有顯著的升學優勢；且在是否完成國中學業這個階段，族群效應與父親教育程度有著顯著的交互作用 (Tsai et al. 1994)。

針對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吳乃德 (1997) 則辨識出「公部門」效應，他的統計分析顯示，父親受雇於政府之軍公教部門，確實對子女的教育成就有顯著影響力。然而在控制了公部門的受雇身分和父親的教育程度之後，族群身分仍然對教育成就有著顯著的影響力，外省籍民

衆仍然有較高的教育成就。不過，如同作者所坦言，這份研究並沒有控制十分重要的城鄉差距，而城鄉差距很可能是解釋顯著省籍效應的重要因素。此外，由於該文主題涵蓋更爲廣泛的社會流動，關於教育成就的分析只選擇了下層階級的樣本作爲分析對象。

除了父母親教育程度之外，王宏仁(Wang 2001)則將父親職業階級也納入分析範圍。根據迴歸分析結果，作者指出，一旦控制了父母親教育程度與父親職業之後，外省族群並沒有顯著的教育取得優勢。然而這份分析也一樣由於樣本數的限制，採取了將不同世代以虛擬變項處理的方式。這種將不同世代樣本放入單一模型的作法，假設了族群效應（不論其爲零或者的確存在顯著淨效應）在不同世代中都是等值，無法檢驗這個變項對於教育取得的影響是否隨著時間而有變化。

駱明慶(2001)採用家庭收支調查的資料來做分析，因此對照其他幾份相同主題之研究，比較沒有樣本數過小、不易區分世代而導致難以對現象做證實的問題。除了父母親教育程度外，作者另外控制了幾個重要變項，包括居住地區以及父親是否於公部門工作。結論是出生於 1960-1974 年的人口中，在尚未控制家庭背景之前，性別間教育成就的差異並不顯著，但省籍間仍有顯著差異（指外省族群有顯著較高的就讀大學比例），最重要的原因是父母親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地城鄉差距的結果。在控制了這兩項重要因素之後，省籍本身並沒有顯著影響。不過這份研究所採用的家庭收支調查，無法分析 1960 年之前出生的世代。

蔡淑鈴(2004)針對「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以及第三個升學階段——高中職升大學）做分析，除了父母親教育程度之外，並控制父親職業地位，但沒有控制城鄉差距；最後得到外省族群於各世代皆沒有顯著差異的結論。這份研究一樣有樣本數有限的問題，最年長的世代組樣本數爲 653，再考量外省族群所佔人口比，很難分析族群效應與其他變項是否有交互影響。

綜合以上既有文獻之發現，可以歸納出幾項結論：一、多數文獻同意外省族群子女，相較於其他族群，（在不控制任何變項的情況

下)有顯著較高的教育成就。二、所有文獻皆同意父母親教育程度為解釋教育成就差異的最重要因素。三、對任何一個世代而言,多數研究顯示,在控制可得之重要家庭背景因素之後,外省族群效應皆消失。換句話說,多數研究者認為父母親教育程度、家庭社經地位,加上居住地區的城鄉差距,即可解釋外省族群的教育優勢。唯一例外的是吳乃德(1997)以及蔡淑鈴等人(Tsai et al. 1994),但前者的分析只限於下層階級,且沒有控制居住地區,而後者所指出的省籍淨效應則是針對升學過程的中段。四、雖然關於族群淨效應存在與否的結論並不一致,但很有趣的是,多數研究者仍會環繞此主題討論一番,並提出各種解釋「外省族群具有教育優勢」的可能性。除了有明確實證基礎的「公部門效應」(指軍公教福利政策、教育津貼等對升學機會的正影響)之外(吳乃德 1997;駱明慶 2001),尚包括:外省族群可能具有語言資本的優勢;外省族群身為新住民,沒有土地房舍店面等可直接繼承的生產條件,因此比較傾向投資在子女教育之上(Tsai and Chiu 1993;吳乃德 1997);以及外省族群的平均子女數較低(吳乃德 1997;駱明慶 2001)等等解釋。

### (三) 小結

以上文獻探討環繞著兩個主題,一是國外文獻中關於教育成就之族群「淨效應」的實證研究與解釋架構,二是台灣本土文獻關於教育成就之省籍差異的實證研究。可以看出來,本土研究者對於如何解釋「教育取得過程中的外省族群效應」有著濃厚的興趣,但關於顯著族群淨效應存在與否的結論並不一致。此外,如同駱明慶(2001)所指出的問題,國內文獻關於族群之間教育成就差異的實證研究,多屬橫斷面情況的描述,少數觸及世代變化的研究也因受限於樣本規模而無法討論世代間的差異。最後,由以上國外文獻探討所觸發的思考重點:族群效應經常與階級、社區環境有著複雜的互動關係,使得特定族群之淨效應很可能與階級及居住地區之間存有交互作用;此外,移民族群之效應也可能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變化,使得我們必須反省:既有

文獻之模型假設是否過於簡化事實？

綜合以上回顧與檢討，本文的研究焦點將在於：以足夠的樣本數，同時控制與省籍變項高度相關的數個重要變項，並適當地分割世代，嘗試辨識出外省族群效應是否存在於教育取得過程當中，並且藉著不同世代間之對比，檢視族群效應是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顯著的變化。<sup>3</sup> 更重要的是，若族群效應——如同眾研究者所臆測——確實存在，我們還要考慮到變項之間交互作用的可能性，進而提問這個效應是全面性的存在於所有外省族群，還是只存在於哪些次群體；以及對於分析結果，又該如何解釋。

### 三、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 （一）資料來源與變項說明

為了滿足可靠資訊與足夠樣本數這兩項條件，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乃是將「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過去十餘年來（1990-2002年）所累積的各期資料合併，並將分析對象鎖定在出生年介於1940至1980年之間，<sup>4</sup>分屬閩南、客家、外省三類族群的受訪者。<sup>5</sup>然而，雖然幾乎每一期皆涵蓋基本資料（出生年、性別、省籍、教育程度、父母親教育程度），但28筆原始資料當中只有15筆同時包含了（15或18歲以前）居住地區與父親職業這兩類資訊。捨棄不包含這兩類資訊的各期資料之後，合併後的資料庫<sup>6</sup>之樣本數為26,207。

3 以上所述問題意識與以下所述研究架構，已等於是戰後台灣教育階層化的長期趨勢分析，但本文只將研究焦點環繞在族群與教育差異這個主題上，而暫時刪去其他面向的檢視與探討，以免過於複雜瑣瑣而失焦。

4 本文研究焦點著重在「穩定的教育體制」下「族群、性別與家庭背景對教育取得的影響」之長期趨勢分析。出生早於1940年者，本省族群歷經政權移轉與體制變化，外省族群則歷經戰亂與移民，宏觀歷史層面的干擾因素太多，因此暫不納入分析範圍。出生晚於1980年者則因樣本數不夠充足而捨棄。

5 台灣地區四大族群（王甫昌2003）中，原住民人口比例最少，而且位居偏遠地帶、真正弱勢的原住民人口很可能不易被納入抽樣母體中，恐有抽樣誤差，因此本研究只取前三大族群的樣本做為分析對象。

6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乃合併「同時包含（15或18歲以前）居住地區與父親職業」的各期資料，總共15筆羅列如下：二期一次問卷I、二期三次問卷I、二期三次問卷II、二

從以上提問可以看出，本研究的焦點依變項在於教育成就(educational achievement)，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最高學歷；有些研究者將之化約為受教育年數，有些則將學歷分層級來作分析。我們如果考慮到台灣歷經快速經濟發展的這數十年間，也同時歷經了各層級（先低而中後高）的教育擴張(educational expansion)，勢必會對教育年數的長期分析結果抱持懷疑，因為這種快速的教育擴張，或多或少可能會影響到教育階層化的過程。不過，正因台灣的教育體制長期在國家的政治掌控之下，中央集權的學校體系始終在「經濟主導教育、教育服務經濟」的原則下發展；透過對高中／職學生比例的控制（張清溪 1994），四年制大學在解嚴前始終被定位為學院取向的菁英教育，此部門的教育擴張在早期可以說是十分緩慢，從「升學窄門」這個詞彙被長期使用可看出端倪。基於以上理由，本文問題意識中的研究範圍雖為廣泛定義的教育成就，但在研究執行上，本分析將依變項鎖定在「是否上（四年制）大學」，認為這個指標最具有長期趨勢分析的穩定性。<sup>7</sup>

本文基本分析的自變項則包括：父、母親教育程度（分為 6 個層級：無或自修、小學畢業、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性別（男性 = 1）；族群（外省族群 = 1；閩南、客家族群 = 0）<sup>8</sup>；（15 或 18 歲以前）居住地區（三類別：台北市、其他都市、<sup>9</sup>鄉鎮地區）；（15 或 18 歲以前）父親職業地位。<sup>10</sup>基本的長期趨勢分析以及次群組分析（第四節第二、三部分）之後，最後於低教育家庭背景此次群組的輔助分析（第四節第四部分）中，則加入另外兩個自變項：父親是否於

---

期五次問卷 I、三期一次問卷 I、三期二次問卷 I、三期二次問卷 II、三期三次問卷 I 長卷、三期三次問卷 I 短卷、三期三次問卷 II、三期五次問卷 I、四期一次問卷 I、四期一次問卷 II、四期二次問卷 I、四期三次問卷 I。

7 就傳統的升學歷程分段分析而言，族群可能對於較早階段之教育成就的影響力較大(Tsai and Chiu 1993)，但本文的焦點依變項「是否上大學」仍是此前後累積的升學歷程之最後結果，即便影響力是發生於升學較早階段，仍會反映在最後的結果之上。但因研究焦點必須有所取捨，關於升學歷程的分段分析，可另闢不同的分析架構來探究。

8 表四為例外，將此三大漢族群分別視為虛擬變項。

9 包括高雄市與省轄市。

10 關於父親職業地位，本文使用 Ganzeboom et al. (1992)的國際職業社經地位量表，將父親職業由類別轉換成 ISEI 分數（10 分到 90 分），做為家庭社經背景的基本控制之一。

公部門工作，以及兄弟姊妹人數。但同時包含這兩項資訊的原始資料筆數並沒有太多，<sup>11</sup> 因此次群組輔助分析部分之樣本數銳減至不到六千，分割為年長與年輕世代兩組後，樣本數分別為 2,963 與 2,640。

## （二）分析方法

本文將樣本按照出生年分為四個世代(1940s, 1950s, 1960s, 1970s)，<sup>12</sup> 少數次群組分析則將前兩個年長世代與後兩個年輕世代合併。第四節分析結果的第一部份將根據樣本中各主要變項的基本分布，對外省與本省族群之間的重大差異做一簡單描繪。第二部分為「誰能成為大學生」的長期趨勢基本分析，將以二元邏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來分析各自變項對二元依變項「是否上大學」的影響強度，同時考慮變項間交互作用的可能性，以及，更重要的，其影響強度是否因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第三部分則根據第二部分的結果，將同世代樣本進一步切割為高教育家庭背景與低教育家庭背景兩個次群組，以對照檢驗省籍效應在不同世代、不同次群體當中的強度與顯著程度有何不同，提供比交互作用項更為清楚而直接的呈現。最後，於第四部分的輔助分析中，進一步增加「父親是否於公部門工作」及「手足數目」兩個控制變項，再一次檢驗所得之外省族群效應。

# 四、分析結果

## （一）各主要變項之族群差異的基本描繪

有些研究者認為外省族群與其他族群之間在教育成就上，於不控

---

11 最後的輔助分析只使用了四筆資料，分別為二期三次問卷 I、三期三次問卷 I 長卷、三期三次問卷 I 短卷、四期三次問卷 I。

12 由於考慮 1968 年延長九年國教政策有可能對於教育取得過程產生影響，多數研究在世代切割上是將 1956 年當作其中一個切割點。但不論是政府統計資料或樣本之描述統計數字皆顯示，九年國教政策之後並不是在兩三年之間馬上達到十分普及的高國中就讀率與畢業率，此階段升學率乃是漸進式的提高，對出生於 1960 年代者才算是真正到達某種程度的國中就學普及率(Chen 2005)，因此本文的世代劃分除簡明之外，也同時考慮了教育政策變革因素。

制任何背景因素的情況下，始終有著顯著的差異（駱明慶 2001）；但也有研究者認為，對年輕的世代來說，三個漢人族群之間的教育差異已經不具統計上的顯著意義了（蔡淑鈴 2004）。實際情況究竟是如何？根據本分析所倚賴的合併資料庫，表一列出樣本中（各族群各世代）上大學人口占該族群人口的百分比來檢視族群之間的差異。從表一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不論著眼於哪一個世代，閩南與客家兩族群之間上大學人口的比例一直十分接近，而外省族群則與其他族群之間有一段很明顯的差距；但這段差距，從分析中最年長的世代（出生於 1940 年代）到最年輕的世代（出生於 1970 年代），很明顯的越來越小；不過，與快速縮小的性別差距——最年輕世代幾已到達兩性零差距——相較之下，省籍之間的確仍存有一些差距（亦可參見表四）。

表一 上大學人口之百分比：各世代族群與性別之差異(%)

出生年	總樣本	族群		
		閩南	客家	外省
總樣本 (N=26,207)				
1940s	7.52	5.70	7.87	27.59
1950s	10.35	7.99	10.20	26.88
1960s	13.37	11.71	10.78	23.89
1970s	19.79	18.77	18.48	27.74
男性 (N=12,984)				
1940s	10.77	8.39	12.32	34.34
1950s	12.63	10.14	12.48	29.54
1960s	15.05	13.08	12.80	26.29
1970s	18.99	18.33	18.09	24.32
女性 (N=13,223)				
1940s	4.07	2.87	2.93	20.26
1950s	8.06	5.83	7.93	24.08
1960s	11.82	10.46	8.88	21.46
1970s	20.56	19.20	18.84	30.86
樣本數	26,207	20,092	3,088	3,027

表二列出（各世代）不同居住地區之上大學人口比例，同時也列出各地區的外省族群人口比例。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城鄉差距與年輕住民上大學機會的大小息息相關，也同時與外省族群人口分布相關。對任何一個世代而言，相較於鄉鎮地區，成長於都市地區的下一代有更高的比例成為大學生；而台北市與其他都市相比，其教育優勢又多了一段明顯的差距。另一方面，外省族群明顯聚居都市地區；與一般都市相較之下，台北市的外省人口則又更為集中。

表三列出各世代（基於父親職業之）不同家庭背景的上大學人口比例，同時也列出各類別中的外省族群人口比例。與表二呈現類似的相關圖像，唯獨此處的農工背景呈現方向相反之負影響。換句話說，農家背景或父親職業為勞工的子女，其上大學機會遠低於父親職業屬其他類別的子女。另一方面，父親職業屬勞工類別的外省族群人口比例，則遠低於「其他」類別；父親職業屬農林漁牧礦業此類別的外省族群人口比例，則又更低。外省族群之新移民性質反映在職業結構上的這種差異，也可再換另一個方式代替表三之(b)部分來呈現：舉例來說，樣本資料顯示，對於出生於 1940 年代的早期世代來說，外省族

表二 不同地區之間上大學人口比例與外省族群人口比例之差異(%)

出生年	總樣本	(15 或 18 歲之前) 居住地區		
		台北市	其他都市	鄉鎮地區
(a) 上大學人口比例				
1940s	7.52	15.92	11.52	5.81
1950s	10.35	18.10	14.60	8.05
1960s	13.37	27.74	16.47	9.85
1970s	19.79	35.19	21.97	14.84
(b) 外省族群人口比例				
1940s	6.91	20.72	15.70	3.61
1950s	11.09	28.28	20.94	5.85
1960s	14.49	30.70	21.24	9.17
1970s	11.70	19.62	12.67	9.23
樣本數	26,207	2,584	6,158	17,465

表三 不同家庭背景之間上大學人口比例與外省族群人口比例之差異 (%)

出生年	總樣本	(15 或 18 歲之前) 父親職業		
		農 <sup>a</sup>	工	其他
(a) 上大學人口比例				
1940s	7.52	2.63	3.46	17.55
1950s	10.35	3.96	6.24	19.74
1960s	13.37	5.33	8.50	22.57
1970s	19.79	7.38	12.40	29.34
(b) 外省族群人口比例				
1940s	6.91	1.13	4.12	17.76
1950s	11.09	1.05	8.07	23.95
1960s	14.49	2.01	11.46	25.69
1970s	11.70	3.02	8.17	17.10
樣本數	26,207	9,397	6,478	10,332

<sup>a</sup> 亦包含林、漁、牧、礦業，唯因農業人口所佔比例甚高，以「農家背景」代稱。

群的農業人口比例為 8.5%，另兩大漢族群的農業人口比例則高達 55.1%，<sup>13</sup> 相差甚為懸殊。

以上的簡單樣本統計數字已提供了一個清楚的基本圖像：第一、對任何世代來說，外省族群的上大學人口比例始終明顯高於其他兩大本省族群，但此差距隨著教育擴張——本省族群有更多的機會進入升學管道——而逐漸變小。第二、城鄉差距與父親職業這兩項家庭背景因素，一方面強烈影響著一個人之上大學機率，另一方面又同時與省籍族群分布密切相關；換句話說，任何檢視外省族群獨立效應的分析，若省略了這兩個變項，都不算完整周全。

## (二) 誰能成為大學生？：從長期趨勢分析檢視省籍效應

針對二元依變項「是否上大學」，在不控制任何其他家庭背景條件的情況下，只放進三大漢族群類別變項的二元邏輯迴歸之分析結果顯示（見表四），對 1940 年代出生的世代而言，相較於人數最多的

<sup>13</sup> 並未提供完整數據圖表，以免性質重複。

閩南族群，外省族群子女上大學的勝算比(odds)增加了五倍多，其相對比(odds ratio)為 6.30；這個教育優勢，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減弱，但對於分析對象中最年輕的 1970 世代而言，外省族群仍然有顯著較高的上大學機會（其勝算比增加了約 66%）。而客家族群之上大學機會，對兩個年長世代而言，在 5% 的顯著水準下，顯著高於閩南族群，而對兩個年輕世代來說此差異則不顯著。由於閩、客兩族群之間的差距幅度不若省籍之間的差異幅度，且不包含在本文有限的探討範圍，以下分析皆將閩、客兩族群合併為本省族群。

表五呈現的則是控制可得之基本家庭背景因素（包括父母親教育程度、城鄉差距、父親職業地位<sup>14</sup>、出生年）之後所得到的主要分析結果。模型一為基本變項，模型二加入省籍與性別的交互作用項，模型三再加入省籍與父親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項（只呈現焦點變項的結果，模型三之完整模型請參見附錄）。在性別方面，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男性上大學機會的優勢，在短短四個十年世代間被女性快速追

表四 「是否上大學」的族群差異：二元邏輯迴歸分析<sup>a</sup>

自變項	出生世代			
	1940s	1950s	1960s	1970s
族群（相對於閩南）				
客家	1.41*	1.31*	.91	.98
	(2.13)	(-.83)	(2.47)	(-.14)
外省	6.30***	4.24***	2.37***	1.66***
	(12.76)	(11.14)	(17.26)	(4.48)
Likelihood Ratio $\chi^2$ (df = 2)	134.7	262.1	120.5	19.5
樣本數	4,615	9,090	8,526	3,976

<sup>a</sup> 表中數字為二元邏輯迴歸所得之相對比(=exp( $\beta$ ))；括號內數據為 z 值。

\* p < .05, \*\* p < .01, \*\*\* p < .001

14 先前表三父親職業結構之省籍差異以「農、工、其他」三分類來呈現，主要由於農、工這兩個類別較具分類的明確性。但正式分析中最後則採取將父親職業轉換為連續變項 (ISEI 分數) 的方式，使職業地位層級之資訊不至流失。基於此控制變項之兩種處理方式 (三分類類別變項以及分數型態的連續變項) 所分別得到的分析結果極為相似，顯示分析結果應具有某種程度的穩定性。

表五 省籍對於上大學機會的影響<sup>a</sup>

自變項 <sup>b</sup>	出生世代			
	1940s	1950s	1960s	1970s
模型一				
男性（相對於女性）	3.27*** (8.24)	1.77*** (7.27)	1.38*** (4.52)	.87 (-1.57)
外省族群（相對於本省族群 <sup>c</sup> ）	1.28 (1.14)	1.40** (2.99)	1.00 (-.02)	1.16 (1.08)
Likelihood Ratio $\chi^2$ (df = 16)	542.1	955.1	1050.9	567.5
模型二				
男性（相對於女性）	3.85*** (8.13)	1.91*** (7.20)	1.35*** (3.71)	.90 (-1.09)
外省族群（相對於本省族群）	2.06* (2.37)	1.67*** (3.36)	.93 (-0.51)	1.31 (1.47)
省籍與性別之交互作用 （外省×男性）	.47* (-2.07)	.73† (-1.66)	1.13 (.71)	.77 (-1.00)
Likelihood Ratio $\chi^2$ (df = 17)	546.6	957.9	1051.4	568.5
模型三				
男性（相對於女性）	3.92*** (8.09)	1.91*** (7.15)	1.35*** (3.70)	.90 (-1.09)
外省族群（相對於本省族群）	4.31** (2.81)	3.20*** (3.93)	2.01** (2.51)	1.30 (.63)
省籍與性別之交互作用 （外省×男性）	.47* (-2.15)	.72† (-1.80)	1.10 (.57)	.77 (-1.00)
省籍與父親教育之交互作用 （外省×父親教育程度）	.83† (-1.63)	.84** (-2.47)	.82** (-3.07)	1.00 (0.02)
Likelihood Ratio $\chi^2$ (df = 18)	548.9	964.0	1060.5	568.5
樣本數	4,015	8,252	7,882	3,691

<sup>a</sup>表中數字為二元邏輯迴歸所得之相對比(=exp( $\beta$ ))；括號內數據為z值。

<sup>b</sup>其他已控制自變項：父母親教育程度、城鄉差距、父親職業地位、出生年；模型三之完整模型詳見附錄。

<sup>c</sup>本分析不包括原住民族群。

†  $p < .1$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趕，對最年輕的世代而言，甚至有局勢逆轉的可能（但並未達顯著水準）。這個性別平等化的趨勢與多數既有文獻完全吻合；不過，性別並非本分析的探討焦點，而只是必要控制的變項。在省籍變項方面，模型一的初步結果顯示，控制基本家庭背景變項之後，只有 1950 年代出生的世代呈現顯著的外省族群之上大學機會優勢，對此世代而言，在相似家庭背景、居住地區等條件下，外省族群子女上大學的勝算比要比本省族群增加了 40%。

不論是一般民衆的個人經驗，還是學術界基於較嚴謹的研究方法所得的結果，都有人指出不同族群之間性別資源配置有所差異（Lin 1998；林鶴玲、李香潔 1999）。因此表五之模型二將性別與省籍之間的交互作用同時考慮進去，<sup>15</sup> 結果發現對年長兩世代而言，省籍與性別之間存有顯著的交互作用。以 1950 年代出生的世代為例，在相似家庭背景、居住地區條件之下，外省女性上大學的勝算比，要比本省女性高出 67%（相對比為  $1.67 = OR_{\text{mainlander}}$ ），<sup>16</sup> 而外省男性相較於本省女性，相對比為  $2.33 (= OR_{\text{male}} \times OR_{\text{mainlander}} \times OR_{\text{male} \times \text{mainlander}})$ ，外省男性相較於本省男性，相對比則為  $1.22 (= OR_{\text{mainlander}} \times OR_{\text{mainlander} \times \text{male}})$ 。換言之，上大學機會之省籍效應對女性的影響顯著大於對男性的影響。不過對年輕兩世代而言，省籍與性別之間的交互作用則不再顯著。

表五之模型三進一步將省籍與父親教育程度之交互作用考慮進去。很有趣的是，加入此互動項之後，省籍效應再度增強且更為顯著。出生於 1940 到 1960 年之間的前三個世代，皆呈現了顯著省籍效應，且此效應隨著父親教育程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父親教育程度越低，省籍效應越高。但從相對比的數值可看出，此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減弱，對 1970 世代而言已看不出省籍效應的顯著性。模型二世代間的效應差異檢定<sup>17</sup> 顯示，1940、1950 兩世代與 1960 世代

15 關於性別與省籍之交互作用，非常感謝交大統計系王維菁教授提出的寶貴意見。

16 OR 指 odds ratio； $OR_{\text{mainlander}} = \exp(\beta_{\text{mainlander}})$ ；其他以此類推。

17 此處採用似無相關估計(Seemingly Unrelated Estimation)來做跨世代比較之效應差異統計檢定。

之間的省籍效應差異，達到 5% 的顯著水準。不過在考慮進省籍與父親教育程度之交互作用後，模型三世代間的效應差異檢定則顯示，1940、1950 兩世代與 1970 世代之間的省籍效應差異，只有在 10% 的顯著水準下才顯著。

表五模型三針對省籍與父親教育程度之間互動關係的發現，將於下一段（第三部分）進一步分析與討論。基於性別與省籍之間顯著交互作用的發現，表六以另一方式（跨組比較）再一次檢驗不同省籍之間的性別效應究竟有無顯著差異：對於 1940、1950 年代出生的世代而言，雖然外省族群當中也一樣存在顯著性別效應（即男性上大學機會的優勢），但經由跨組比較的統計檢定結果顯示，閩、客族群之間性別效應之強度的確顯著高於外省族群( $p < .05$ )；然而對於 1960、1970 年代出生的世代而言，不同省籍之間性別效應的差異則不再顯著。

### （三）省籍效應之次群組分析

在本文第二節文獻回顧中，曾提及美國近十幾年來關於不同族群在各生活面向（包括教育取得）上呈現十分複雜、無法以單一模式來套用的差異結果；而這一系列探討所提供的重要訊息之一，乃是族群身分經常與家庭背景之其他面向有著交錯的互動關係。換句話說，同一族群在甲處境／結構條件下會得到 A 結果，但在乙處境／結構條件下卻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 B 結果。倘使在教育取得的過程中，真存有

表六 是否上大學：比較不同省籍之性別效應<sup>a</sup>

性別效應 <sup>b</sup>	出生世代			
	1940s-1950s		1960s-1970s	
	外省	閩、客	外省	閩、客
男性	1.45**	2.30***	1.22	1.14*
（相對於女性）	(2.67)	(10.55)	(1.56)	(2.07)
	N=1,158	N=11,109	N=1,502	N=10,071

<sup>a</sup> 表中數字為二元邏輯迴歸所得之相對比(=exp( $\beta$ ))；括號內數據為 z 值。

<sup>b</sup> 其他已控制自變項：父母親教育程度、城鄉差距、父親職業地位、出生年。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族群淨效應，對不同族群次群體的影響強度卻很可能不同，甚至對於某些次群體來說此效應未必存在。一方面，根據前述分析結果，顯示省籍效應與父親教育程度的確存有顯著互動關係，另一方面，鑑於台灣的教育取得研究之既有文獻指出，「父親教育程度」於各升學階段當中始終是最為重要的解釋變項（如 Tsai et al. 1994），因此，在基本分析之後，本文進一步將家庭背景依照父親教育程度區分為兩個次群組：高教育家庭背景相對於低教育家庭背景；同時，基於以上分析發現省籍之間的性別差距存有顯著不同這個理由，也將男性與女性兩個群體區分開來。藉著次群組分析，希望可以更清楚的呈現：不同次群組之間，省籍效應呈現如何不同的樣貌。

表七呈現出次群組分析的有趣結果。首先來檢視 1940、1950 這兩個年長世代。對高教育家庭背景這個次群組而言，先前分析所得到的省籍與性別之間的顯著互動關係，在此次群組當中並不明顯，其差異並未達顯著的統計水準。此外，更重要的是，出身高教育家庭背景的下一代當中，外省族群——在控制其他一般家庭背景條件之下——在上大學的機會上並沒有任何顯著的優勢，不論對男性或女性來說都是如此。然而，對低教育家庭背景這個次群組而言，卻呈現截然不同的結果：不論對男性或女性來說，皆存在顯著的外省族群效應；外省男性上大學之勝算比較本省男性增加了 64%，而外省女性上大學之勝算比則為本省女性的 2.1 倍。至於 1960、1970 這兩個較年輕之世代，也有類似的情形：對高教育家庭背景這個次群組而言，並沒有顯著的省籍效應（由相對比數據來看，外省族群反而顯得弱勢，但未達顯著水準）；而在低教育家庭背景這個次群組裡，外省男性上大學之勝算比仍然比本省男性增加了 49%，但對女性來說此效應則未達顯著水準。換言之，對這個年輕世代而言，男性當中的省籍效應反而要高於（早期省籍效應甚高的）女性群體。<sup>18</sup>

---

18 鑑於不同省籍之間農業人口比例的懸殊差異，有可能讓分析結果受到農家背景子女就學機會的顯著弱勢所影響，我們以另兩種方式來檢測表七的結果是否會因家庭背景控制不佳而不夠可靠：(1)以虛擬變項控制農、工背景；(2)暫時捨棄農業人口樣本。結果

表七 是否上大學：比較不同次群組之外省族群效應<sup>a</sup>

外省族群效應 <sup>b</sup>	出生世代			
	1940s-1950s		1960s-1970s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高教育家庭背景 <sup>c</sup>	.96 (-.24) N=755	1.21 (.99) N=687	.88 (-.94) N=1,271	.81 (-1.51) N=1,265
低教育家庭背景	1.64** (2.77) N=5,495	2.10*** (3.56) N=5,328	1.49** (2.56) N=4,379	1.33 (1.57) N=4,654

<sup>a</sup> 表中數字為二元邏輯迴歸所得之相對比(=exp( $\beta$ ))；括號內數據為 z 值。

<sup>b</sup> 其他已控制自變項：父母親教育程度、城鄉差距、父親職業地位、出生年。

<sup>c</sup> 高教育家庭背景=父親教育程度為高中(職)或以上；低教育家庭背景=父親教育程度為國(初)中或以下。

\*\* p < .01, \*\*\* p < .001

總而言之，對出生於 1940、1950 年代的人來說，誰能夠通過一關接著一關的升學窄門成為大學生？在相同的父母親教育程度、居住地區、及父親職業地位等條件下，早期外省族群子女的確比其他族群子女擁有更大的機會成為大學生，只不過外省族群的這項教育取得優勢，只存在於低教育家庭背景這個次群組當中，而不存在於高教育家庭背景次群組當中。至於出生於 1960、1970 年代的世代，對低教育家庭背景的下一代而言，仍有顯著效應(男性)或未達顯著水準的正效應(女性)；但從相對比數值可看出，相較於早期，此效應已減弱許多。

#### (四) 輔助分析：其他家庭背景變項

前述分析在低教育家庭背景之次群組當中發現了顯著的外省族群效應，然而，本文接著想問的是，基本分析當中並未控制的、且可能影響教育成就的其他家庭背景因素，是否可以解釋前述分析中所出現

(係數與顯著程度)與表七中低教育家庭背景次群組所得的結果幾乎沒有差異。這表示，即使不將農家背景子女納入分析範圍，此處所得的省籍效應仍然顯著存在。

的效應？換句話說，此處族群身分的顯著獨立效應，是否只是由於哪些與資源配置有關的背景變項尚未被控制呢？

先前的本土文獻回顧已提及，一旦論及外省族群之教育優勢，最常被研究者提出的一大解釋乃是「公部門效應」，指（外省族群比例甚高之）軍公教部門因其種種相關福利與教育津貼所帶來的正效應。即使不論及學費減免等等與升學的經濟考量直接相關的因素，任職於國家公部門當中，「鐵飯碗」的保證（即工作穩定度），以及對未來退休金之可靠預期等因素，都應當大大提高家長為子女教育做投資的意願，而為其子女教育優勢提供十分合理的解釋。除此之外，基於「資源稀釋」(resource dilution)的理論觀點(Blake 1989)，過多的子女數目會分散、稀釋固定的家庭資源，而使得個別子女得到的資源較少、成就較低；外省族群（比本省族群）略低的平均子女數，則也是另一種可能與「公部門」效應並存的解釋，雖然較少人提及（吳乃德 1997）。此處僅暫先提及這兩項可能解釋，只是因為這兩者是本分析所倚賴之合併資料庫，想再做更進一步分析時勉強可得之唯二變項。

表八比較了「父親任職於公部門比例」與「平均子女數」的省籍差異。不論是對該世代的總樣本，或稍後將進一步分析的低教育家庭背景之次群組來說，父親工作於公部門比例的省籍差距都相當大。至於平均子女數，差距不算太大：對低教育次群組來說，不同省籍之間的平均子女數相差不到一個。

接下來，抽出外省族群效應十分顯著的「低教育家庭背景」次群組，並將「公部門」與「兄弟姊妹數」這兩個變項依次納入先前之基本模型，<sup>19</sup> 來驗證以上論點對於上述分析所暫時呈現的省籍效應，是否具有某種程度的解釋力（見表九）。對出生於 1940、1950 年代的年長世代來說，表九模型二的結果顯示：「父親工作於公部門」本身的影響力雖未達顯著水準，但的確對於外省族群效應具有某種程度的解釋力（相對比由 3.22 降為 3.05）。模型四的結果發現：「兄弟姊妹

19 因同時包含加入之二變項的資料庫筆數有限，且分析僅限於低教育家庭背景者，為維持足夠樣本數，此處僅區分年長世代(1940s-1950s)及年輕世代(1960s-1970s)。

表八 「任職於公部門比例」與「平均子女數」之省籍差異

	出生世代			
	1940s-1950s		1960s-1970s	
	總樣本	低教育 <sup>a</sup> 次群組	總樣本	低教育 次群組
外省族群：父親工作於公部門比例	54.07	38.71	49.64	36.98
本省族群：父親工作於公部門比例	11.82	9.41	12.23	7.82
外省族群：平均子女數	4.65	5.04	3.75	4.02
本省族群：平均子女數	5.93	5.97	4.34	4.51

<sup>a</sup> 指父親教育程度為國（初）中或以下的低教育家庭背景次群組。

數」雖的確如同資源稀釋論點所預期般具有顯著負效應，但在控制了手足數目與「公部門」效應（及省籍與性別之交互作用項<sup>20</sup>與其他基本自變項）之後，外省效應仍然顯著。換句話說，對於出身低教育家庭背景的孩子來說，過多的手足數目會顯著降低他／她的教育成就，父親擁有鐵飯碗也許會為他／她增加上大學機率，然而，這些因素都同時考慮進去之後，外省族群身分之於上大學機會的影響強度雖稍微降低，卻仍然十分顯著，其勝算比仍然較閩、客族群高出 177% 之多。

至於出生於 1960、1970 年代的年輕世代，由於：一、原先分析雖同樣觀察到顯著省籍效應，但與早期相較，強度已在削弱中；二、由於此輔助分析樣本數銳減、標準差變大之故，原先（指在捨棄沒有「父親是否於公部門工作」及「手足數」這兩項資訊的資料庫之前）所呈現的顯著省籍效應，在此處從模型一開始，雖得到相差不大的相對比，然而所呈現之省籍效應卻不顯著，很難做明確的詮釋。換言之，當我們在包含足夠樣本數的分析中能夠同時呈現具有統計意義的顯著水準(statistical significance)以及具有實質意義的相當差異(substantial significance)之時，同一模型（雖得到相差不大的係數值）卻在樣

20 省籍與性別兩者在基本分析中呈現顯著的互動關係，但此交互作用項在此輔助分析中由於排除了沒有「父親是否於公部門工作」及「手足數」這兩類資訊的資料庫之後，樣本數銳減，因而失去原先的顯著統計水準。不過係數值並沒有太大差異，由相對比數據仍可看出省籍間明顯不同的性別差異。

表九 是否上大學：「低教育家庭背景」<sup>a</sup>次群組再分析<sup>b</sup>

自變項 <sup>c</sup>	出生世代 1940s-1950s			
	(1)	(2)	(3)	(4)
男性（相對於女性）	2.54*** (5.05)	2.54*** (5.05)	2.47*** (4.90)	2.46*** (4.88)
外省族群（相對於本省族群） <sup>d</sup>	3.22*** (3.24)	3.05** (2.96)	2.94** (2.97)	2.77** (2.66)
性別與省籍之交互作用 （男性×外省族群）	.43† (-1.66)	.44 (-1.61)	.44 (-1.61)	.45 (-1.55)
父親工作於公部門	--	1.19 (.74)	--	1.19 (.75)
兄弟姊妹數	--	--	.89** (-2.91)	.89** (-2.90)
Likelihood Ratio $\chi^2$ (df)	157.7(13)	158.3(14)	165.7(14)	166.3(15)
樣本數	2,963	2,963	2,963	2,963
自變項	出生世代 1960s-1970s <sup>e</sup>			
	(1)	(2)	(3)	(4)
外省族群（相對於本省族群）	1.33 (1.22)	1.28 (1.02)	1.32 (1.19)	1.27 (0.98)
父親工作於公部門	--	1.14 (.60)	--	1.14 (.60)
兄弟姊妹數	--	--	.99 (-.24)	.99 (-.24)
Likelihood Ratio $\chi^2$ (df)	103.5(11)	103.9(12)	103.6(12)	103.9(13)
樣本數	2,640	2,640	2,640	2,640

<sup>a</sup> 低教育家庭背景＝父親教育程度為國（初）中或以下。

<sup>b</sup> 表中數字為二元邏輯迴歸所得之相對比(=exp( $\beta$ ))；括號內數據為 z 值。

<sup>c</sup> 其他已控制自變項：父母親教育程度、城鄉差距、父親職業地位、出生年。

<sup>d</sup> 本分析不包括原住民族群之樣本。

<sup>e</sup> 此年輕世代中，性別、以及性別與省籍之交互作用項皆已不具顯著效應，故分析中沒有納入交互作用項，性別則納入但未列出。

†  $p < .1$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本數不足、標準差變大的情況下失去其顯著水準。這種現象也再度以實例證明本文於前言部分所指出的足夠樣本數在趨勢分析以及少數族群效應等研究中之重要性。但也由於資料限制之故，只能將這部分分析定位為輔助分析。

## 五、討論

### （一）重探早期的「省籍效應」

對於省籍與教育成就之間的關係，以上分析為許多問題提供確實線索——獨立於一般社會經濟背景之運作機制的省籍效應是否存在？發生於何時？發生在哪些人身上？是否隨時間有所變化？不過，此處更重要的應該是，既然有了更進一步的細緻了解，該如何詮釋分析結果、提供解釋呢？先縮小討論範圍，將之限定在：在「公部門效應」與「手足競爭效應」進一步被控制之後，我們要如何解釋早期（1940、1950 兩個年長世代）發生於「低教育家庭背景」此次群組當中，十分顯著的外省族群效應？以下提供四個解釋（一個明確解釋以及三個可能解釋）。<sup>21</sup>

首先，在基本分析中一開始所發現的省籍與性別之間的交互作用，仍可以用來解釋部分的外省族群效應。有研究者以質化研究方法指出，台灣閩、客、外省族群的家庭中展現了不同的性別資源配置，也就是說，本省家庭反映在資源配置方面性別不平等的情形要較外省家庭嚴重（林鶴玲、李香潔 1999）。本文以量化分析證實了在升學機會上這種重男輕女程度之省籍差異；對於年長世代，之所以出現顯著的外省族群效應，有部分的原因是由於早年本省女性在升學機會上極端的弱勢，使得外省女性得到相對優勢而造成的結果。至於如何解釋

---

21 感謝本文其中一位匿名評審的提醒。筆者必須補充說明的是，家庭社經地位變項若沒有很好的測量，或沒有完全被控制(omitted variables)，也會高估省籍效應。在企圖解釋此效應的同時，日後研究方向亦必須注意到是否仍存有未被控制的家庭背景、社會結構因素，才是解釋此效應的真正因素。

這種性別資源配置的省籍差異？除了經濟資源的差異（例如公部門效應）之外，前述文獻並不排除省籍文化差異的可能性；而文化差異很可能仍有其結構性根源，例如，閩、客等定居已久的在地族群，其家庭結構與人際網絡的主要型態展現在大家族，或是緊密的地區家族網絡，性別角色較為僵固、傳統；相對的，經歷戰亂與倉促移民的外省族群，「在台灣少有盤根錯節的大家族關係和社會網絡，家中性別角色的內容有了再造的機會」（林鶴玲、李香潔 1999: 519）。不過，性別不平等的省籍差異這項解釋雖重要，但卻無法解釋在男性群體中也出現的省籍效應。

解釋省籍與教育成就兩者之關係的另一項重要解釋乃是語言資本。多數研究者認為，戰後台灣的特殊歷史時空，導致教育體系長期處於政治控制下，獨尊國語、貶抑地方方言之教育政策，使得不擅國語的本省籍家庭少了一項語言文化資本，<sup>22</sup> 很有可能使得下一代在理解學習內容、升學競爭等過程中略居弱勢(Tsai and Chiu 1993)。語言資本，尤其是對於出身低教育家庭背景的學生而言，的確有可能成爲一項關鍵因素；然而，這只是其中一種可能解釋，因爲資料的限制，我們並無法將其效應與稍後將提及的其他可能解釋相互區隔開來；不過，本分析可以讓我們確定的是，對於高教育家庭背景之子女來說，即使外省族群或許享有多一點的「公部門正效應」<sup>23</sup> 及語言資本，但並沒有證據顯示：本省下一代因此而略居弱勢。

對於低教育家庭背景這個次群組而言，最後分析中仍然剩餘的外省族群效應，語言資本的效應真的能夠完全解釋嗎？從國外文獻探討當中，我們發現，除了父母親教育程度、家庭社經背景等影響教育取得的關鍵運作機制之外，「社會資本」本身在某些特定時空環境下，也可能展現其獨立的影響力。James S. Coleman and Thomas Hoffer

---

22 蔡淑鈴(2001)即將國語能力視爲一種語言資本，並將之帶進地位取得研究裡。不過，因資料的限制（要準確評估「十五歲以前家庭環境之語言資本」並取得資料，具有相當的困難度），該研究無法探究語言資本與教育成就之間的關係。

23 對於「高教育家庭背景」次群組來說，「父親任職於公部門」確實具有顯著正效應( $p < .1$ )，相對比在早年約爲 1.53，在後期爲 1.35。

(1987)即認為，社區當中老師、家長、與學生（同儕）之間的強連帶，以及透過緊密人際網絡所形成的（重視教育的）價值觀與氛圍，正是美國私立天主教學校的學生（相較於一般公立高中學生），顯著較高的學業成績與較低的輟學率之最重要關鍵因素。類似地，某些美國地區的越南移民族群，其下一代的學業表現與升學意願，顯著高於同樣出身低社經背景的其他族群子女，Zhou and Bankston (1994)也認為其（族群）社區獨特的緊密人際網絡，能夠為這種族群差異提供解釋；他們甚至主張，在某些情況下，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可以凌駕人力資本（指父母親教育程度）之上。因此，本文在這裡要為本分析所發現的外省族群效應提出另一種可能解釋：「眷村效應」。在早年獨特歷史時空下，鷄犬相聞的居住模式、歷經戰亂與離鄉背井的相似經驗、置身新環境的相同處境等等多重因素的交錯相乘，都很有可能使得聚居於眷村當中的外省人口形成比一般情況下更為緊密的社區人際連帶。在這樣的氛圍下，家長所偏好之規範與價值觀可以被強化，緊密社區團體可以形成一種無形監控機制（助於管教子女），來自家庭外部的課業協助也可能帶來實質的幫助；而這些「社會資本」，也許對高教育家庭背景的孩子來說，並未產生太大的效應，但對低教育家庭背景的孩子來說，有其關鍵性的影響力。不過正如前所述，即便這種可能性具有某種程度解釋力，此效應可能只存在於特定歷史時空中，並與下一段所討論的、只發生在早期一兩代移民人口身上的「新移民」效應相互交錯結合。時間一旦拉長，社區之孤立性質對其成員未必是正向影響，甚至很有可能產生負面影響。

最後，關於國外文獻所發現的「新移民」效應（指第一、二代的新移民之教育成就要比定居已久的移民更高）(Fuligni 1997)，雖然研究者多將之歸因於「移民至新環境這個過程中所展現的『樂觀主義』」(Kao and Tienda 1995)，然而，樂觀心態未必是唯一可能的詮釋。即使是非自願的新移民，如同台灣早期的外省族群，也很有可能在身無長物，相較於在地族群，缺乏土地房舍店面等資源之情況下，教育成為唯一可能的生存工具與晉升階梯，因而傾向抱持重視教育的

價值觀與更強烈的成就「動機」(motivation)。換言之，與其說「樂觀主義」，倒不如說移民處境及其附帶的主觀感受，更能夠解釋「新移民」效應。

## (二) 逐漸減弱的省籍效應

以上討論嘗試為本分析之研究發現提出解釋。然而，當戰後台灣早期的低教育家庭背景之下一代，展現了顯著的、可能以族群身分作為獨立運作機制的上大學機會差異，我們又該如何解釋省籍效應之逐漸減弱呢？上述幾項可能解釋的前後推論，幾乎都可以同時解釋後期逐漸減弱的省籍效應：

第一、性別不平等的省籍差異，在早年使得外省女性得到教育機會的相對優勢；然而，在社會轉型、經濟發展、快速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閩、客族群的女性不必再扮演為兄弟未來發展而犧牲自己人力資本投資機會的角色，也因而獲得越來越平等的教育機會(Parish and Willis 1993)。本省族群的兩性差距迅速縮小，同時也使得早先外省女性（相對於本省女性）之升學優勢逐漸消失。這個因素，對於較年輕的兩個世代（1960、1970年代出生者）而言，解釋了逐漸減弱的省籍效應。

第二、語言資本的省籍差異，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族群的融合、國語使用的普遍，而使其效應逐漸減弱。

第三、蘊含社會資本的「眷村效應」，也有可能由於「只有舊人口遷出、少見新成員遷入」而在時間長軸上逐漸瓦解，或者隨著與大環境之間的互動、融合，而使其緊密社區連帶的特質有所改變。

第四、「新移民效應」這樣的論點，本身就是以觀察到新移民平均更高的教育成就為起點，並以證明新移民（相較於舊移民）重視教育與較為強烈的成就「動機」為其論述重點；自然完全符合本分析所辨識出來「早期強後期弱」的省籍效應。至於如何詮釋這份強烈動機，本文則與既有文獻的觀點略有出入：新移民未必是因「樂觀主義」而抱持強烈動機，因此，舊移民也未必是因為不再相信投資教育

有利其階級流動，而失去了早先的卓越表現。舊移民或代數較多的移民，很有可能在完全適應在地環境的情況下，我群與外界之間差異突兀對比的程度降低、界線不再清晰、關係不再緊繃，因而逐漸失去了原先基於不熟悉新環境、擔心無法生存的恐懼所衍生出來的強烈成就動機。

最後，還有兩個上一段沒有涵蓋的可能因素，可以用來解釋逐漸減弱的省籍效應：一是，相較於 1940、1950 年代出生的外省人口，1960、1970 年代出生的世代之平均父親年齡可能較高（指延遲結婚與生子的外省人口），而一般說來，過高的父親年齡對子女教育成就有可能會有負影響。<sup>24</sup> 二是，對於較年輕的兩個世代而言，當本省族群分享經濟起飛帶來的實質利益之時，缺乏不動產資源的外省族群（尤指低社經家庭背景者）在這方面可能顯得相對弱勢（王甫昌 2003: 149），也因而沖淡了原先或許來自語言資本、社會資本等因素所造成的外省族群優勢。

## 六、結語

大體而言，本文研究發現的部分都與既有文獻吻合，例如：蔡淑鈴等人所指出，省籍效應在是否完成國中學業這階段，與父親教育程度有著顯著的交互作用 (Tsai et al. 1994)，吳乃德(1997)針對下層階級所發現的顯著省籍效應（但並未控制城鄉差距），林鶴玲針對家庭資源配置所發現的性別不平等之族群差異(Lin 1998)，以及駱明慶(2001)針對 1960 年之後出生的世代所做的長期趨勢分析。然而，在片斷的吻合之外，本分析能夠提供的貢獻在於將各部分各面向之片段，拼湊成更為完整的圖像，並以更進一步的次群體分析，使我們更為了解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發生在社會的哪些群體身上，長期如何變遷等等。這樣的研究發現，主要歸因於足夠的樣本數，使我們能夠探測

---

24 不過，駱明慶(2001)之分析結果顯示，父親年齡對子女教育成就的影響並不顯著。

出：一、外省族群身分的影響的確存在，但與性別效應類似地，此影響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減弱、消失，對出生於 1970 年代之後的年輕世代來說，已無顯著省籍效應。二、在早年，本文發現省籍與性別兩變項之間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亦即外省族群中上大學機會的兩性差距要比本省族群來得小。三、在控制父母親教育程度、城鄉差距、父親職業地位之後，省籍效應同時也依父親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變化；對高教育家庭背景的子代來說，並沒有統計證據顯示省籍對於任何出生世代之上大學機會有影響；但本文在低教育家庭背景的子代中發現了相當顯著的省籍效應——外省族群身分對一個人上大學的機會確有影響，對出生於 1940、1950 年代的年長世代來說尤為顯著，在進一步控制公部門效應與手足數之後仍有影響；不過，此效應已隨時間推移而減弱，甚或消失。整體來說，族群身分對於教育成就的影響，與其所鑲嵌之社會脈絡息息相關，不僅依時代變遷，也因性別及階級之不同而有所差異。正如本文標題所隱含的暗示：族群、性別與階級，如此不同之各種社會生活面向，並非以各行其是的力量在運作，它們彼此糾纏交錯所展現的複雜度往往出人意料。

本文的研究發現，同時揭露了一個銅板（指族群）的兩面，也破解了一些常見的迷思。很多人在論及外省族群人口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時，顧及省籍話題在台灣社會之敏感性，經常會隨即論及省籍與階級之間交錯的複雜性，亦即想要強調外省族群當中之異質性：同一族群包含了高社經地位的「既得利益者」與低社經背景的「歷史洪流之受害者」；這樣的分類隱含著前者優勢而後者弱勢的暗示。然而，本文的研究結果卻發現，對同樣高教育家庭背景（有較大的機會等同於高社經家庭背景）的子代來說，即使是在早年，並沒有證據顯示外省族群效應曾經存在過。這也就是說，即使外省族群所集中的公部門所附帶之福利優惠具有顯著正效應（見註釋 23），即使語言資本在就學過程中的確有點幫助（此點尚無法證明），但事實上，本省族群子女並不曾因為這些原因而在上大學機會上更顯吃虧；這樣的結果強烈地暗示著：教育程度佳、資源豐厚的家長無論如何都有辦法在教

育子女的過程中提供適時的支援與彌補。（這樣說來，至少在聯考至上的升學體制裡，「既得利益」的論點不能過度通則化，最多也許只能限於金字塔頂端的極少數政治權貴。）

至於銅板的另一面呢？有趣的是，對後者（低教育家庭背景，亦即有較大的機會等同於低社經家庭背景）來說，本文卻在這個次群組當中發現了相當顯著的正影響——族群身分之於一個人上大學的機會，的確可能有獨立於社會經濟背景的影響力；但其強度在 1960 年代出生的世代身上已逐漸減弱，且在 1970 世代身上已沒有顯著的省籍獨立效應。早年性別不平等的省籍差異，可以解釋部分的省籍效應；其次，在進一步控制「公部門效應」（多數學者所公認的關鍵因素）以及「手足競爭效應」（外省族群平均較低的子女數）之後，此效應並未完全消失，尤其對年長世代而言仍然顯著；這項族群身分之於上大學機會的獨立效應，有可能是語言資本、社會資本（眷村效應）與新移民處境等相互交錯的因素所造成的結果。不過，由於資料的限制，本文很難再繼續區辨何者才是真正的關鍵影響機制，或者還有其他更細緻的原因，只能留待未來讓研究者們共同探究。

不論是從探究「不平等」之根源及其展現模式這個角度出發，或是要換個角度，強調不可化約的「社會事實」對個人之有形與無形影響，這兩者都可說是社會學的核心關懷；而關於階級、族群、性別（或是社會生活之其他重要類屬）等各項人群分類的「差異」結果之研究，能夠同時回應這兩種方向略有不同的核心關懷。然而，顯現「差異」的結果，固然是探究現象的第一步，起點與終點之間的複雜細緻過程並非總是不證自明。因此，本文之發現與未能發現，都值得其他領域的研究者來注意或繼續深究。首先，本文所顯示的省籍與性別之間的互動關係，與家庭領域既有文獻中關於家庭決策模式、婚姻權力結構的省籍差異（陳玉華等 2000），顯現一致的方向。這使我們想問，新移民群體的結構位置，究竟如何影響婚姻與家庭中的性別關係。是結構位置下的社會心理因素？婚姻市場中競爭的結果？還是家庭結構的差異這個因素，具有更大的解釋力？再者，關於省籍與階級

之互動，當劣勢階級中出現省籍效應的同時，何以優勢階級當中並無明顯省籍差異？在競取資源的複雜過程中，優勢階級之所以為優勢，是否在於能夠透過各項資源之組合、交換、替代，來彌補其他「社會力」所造成的影響？此處的發現以及進一步的思考與提問，並非單一領域研究所能周全處理，而有賴未來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出發，共同探索。正如現實世界裡的社會生活，不會只依循單一面向的邏輯而運作，社會學知識的累積，也不能夠忽略不同領域之間的對話、連結與整合！

誌謝：本文為作者博士論文的部分成果及其延伸探討，首先感謝論文指導教授 William Parish 在資料分析及論文寫作過程的指導與討論。本文寫作期間曾在台灣社會學年會、台大經濟系進行口頭報告，感謝與會諸位學術先進提供意見。另外，特別要感謝王維菁、駱明慶、林明仁、曾熾芬的寶貴意見；更感謝《台灣社會學》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耐心閱讀與極具建設性的修改建議，以及主編謝國雄、副主編蘇國賢對於本文問題意識所給予的意見，讓本文更加嚴謹，亦使作者受惠良多。最後，也十分感謝編輯謝麗玲的細心溝通協助。謹此誌謝。本文之全部論點、見解及錯漏，概由作者自負。

附錄 家庭背景對上大學機會的影響：多變項二元邏輯迴歸分析<sup>a</sup>  
 (表五模型三之完整模型——以原始係數呈現)

自變項	出生世代			
	1940s	1950s	1960s	1970s
父親教育程度 (參照群組=無或自修)				
小學	1.04*** (.23)	.99*** (.15)	.79*** (.18)	.89** (.35)
國(初)中	1.37*** (.29)	1.37*** (.18)	1.24*** (.20)	.84* (.37)
高中(職)	1.90*** (.31)	1.56*** (.20)	1.89*** (1.21)	1.18*** (.37)
專科學校	2.11*** (.39)	1.70*** (.24)	2.12*** (.24)	1.63*** (.39)
(四年制)大學	2.55*** (.43)	2.06*** (.27)	2.39*** (.27)	1.73*** (.42)
母親教育程度 (參照群組=無或自修)				
小學	.62*** (.17)	.32** (.10)	.47*** (.10)	.67*** (.19)
國(初)中	.57* (.29)	.73*** (.16)	.74*** (.15)	1.08*** (.22)
高中(職)	.84** (.31)	.91*** (.19)	.81*** (.18)	1.41*** (.24)
專科學校	.55 (.51)	1.53*** (.30)	1.35*** (.32)	1.59*** (.30)
(四年制)大學	1.25* (.54)	2.02*** (.42)	3.98*** (.82)	1.93*** (.35)
性別、族群，與交互作用項				
男性(相對於女性)	1.37*** (.17)	.65*** (.09)	.30*** (.08)	-.10 (.10)
外省族群(相對於本省族群) <sup>b</sup>	1.46** (.52)	1.16*** (.30)	.70** (.27)	.26 (.42)
省籍與性別之交互作用 (外省×男性)	-.76* (.36)	-.33† (.19)	.10 (.17)	-.26 (.27)

(續)

## 附錄 家庭背景對上大學機會的影響：多變項二元邏輯迴歸分析（續）

省籍與父親教育之交互作用 （外省×父親教育程度）	-.19 <sup>†</sup> (.12)	-.18** (.07)	-.20** (.06)	.002 (.09)
（15 或 18 歲以前）居住地區 （相對於鄉鎮地區）				
台北市	.16 (.22)	.14 (.12)	.51*** (.11)	.48*** (.13)
其他都市	.04 (.17)	.10 (.10)	.11 (.08)	.20* (.10)
其他控制變項				
（15 或 18 歲以前）父親職業地位	.03*** (.005)	.02*** (.003)	.02*** (.003)	.02*** (.004)
出生年	.03 (.02)	-.01 (.01)	-.01 (.01)	.05*** (.02)
常數項	-60.20 (45.26)	16.59 (26.30)	8.02 (25.19)	-107.45 (31.25)
Likelihood Ratio $\chi^2$ (df = 18)	548.9	964.0	1060.5	568.5
Pseudo R <sup>2</sup>	.252	.172	.167	.151
樣本數	4,015	8,252	7,882	3,691

<sup>a</sup> 括弧中為標準差。

<sup>b</sup> 本分析不包括原住民族群。

<sup>†</sup>  $p < .1$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參考文獻

- 王甫昌 (2003)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 吳乃德 (1997) 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 1: 137-167。
- 林忠正、林鶴玲 (1993) 台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見張茂桂等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 101-160。台北：業強。
- 林鶴玲、李香潔 (1999) 台灣閩、客、外省族群家庭中之性別資源配置。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1(4): 475-528。
- 陳玉華、伊慶春、呂玉瑕 (2000) 婦女家庭地位之研究：以家庭決策模式為例。台灣社會學刊 24: 1-58。
- 張清溪 (1994) 九十年來的台灣學校教育。見梁國樹編，台灣經濟發展論文集：紀念華嚴教授專集，頁 403-445。台北：時報文化。
- 蔡淑鈴 (2001) 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台灣男性的族群差異。台灣社會學 1: 65-111。
- (2004) 高等教育的擴展對教育機會分配的影響。台灣社會學 7: 47-88。
- 駱明慶 (2001) 教育成就的省籍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 29: 117-152。
- Bankston, Carl L. III, Stephen J. Caldas, and Min Zhou (1997)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Vietnamese American Students: Ethnicity as Social Capital. *Sociological Focus* 30(1): 1-16.
- Blake, Judith (1989) *Family Size and Achieve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 Wan-Chi (2005) *Does Social Origin Weigh More When a Society Gets Richer? - Over-time Analysis of Social Origin's Influence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Postwar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 Coleman, James S. and Thomas Hoffer (1987) *Public and Private High Schools: The Impact of Commun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de Graaf, Paul M. and Harry B.G. Ganzeboom (1993) Family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for the 1891-1960 Birth Cohorts. Pp. 75-99 in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 edited by Yossi Shavit and Hans-Peter Blossfeld. Boulder: Westview.
- Fuligni, Andrew J. (1997)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Adolescents from Immigrant

- Families: The Roles of Family Background, Attitudes, and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68(2): 351-363.
- Ganzeboom, Harry B.G., Paul M. de Graaf, and Donald J. Treiman (1992)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1(1): 1-56.
- Kao, Grace and Jennifer S. Thompson (2003) Racial and Ethnic Stratification i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 417-44.
- Kao, Grace and Marta Tienda (1995) Optimism and Achievement: The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 Youth.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6(1): 1-19.
- Lin, Holin (1998) Gender Culture as Economic Determinant: 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Strategies among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10(4): 611-659. (Taiwan, Taipei)
- MacLeod, Jay (1987) *Ain't No Makin' It: Leveled Aspirations in a Low-Income Neighborhood*. Boulder: Westview.
- Ogbu, John (1987) Variability in Minority School Performance: A Problem in Search of an Explanation.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18(4): 312-334.
- Parish, William L. and Robert J. Willis (1993) Daughters, Education, and Family Budgets: Taiwan Experience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8(4): 863-898.
- Portes, Alejandro and Min Zhou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 74-96.
- Schneider, Barbara and Yongsook Lee (1990) A Model for Academic Success: The School and Home Environment of East Asian Students.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21(4): 358-377.
- Shavit, Yossi and Hans-Peter Blossfeld, eds. (1993)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 Boulder: Westview.
- Trueba, Henry T. (1988) Culturally Based Explanations of Minority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19(3): 270-287.
- Tsai, Shu-Ling and Hei-Yuan Chiu (1993) Changes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Taiwan. Pp. 193-227 in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 edited by Yossi Shavit and Hans-Peter Blossfeld. Boulder: Westview.
- Tsai, Shu-Ling, Hill Gates, and Hei-Yuan Chiu (1994) Schooling Taiwan' Wome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Mid-20th Century.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7:

243-263.

Wang, Hong-Zen (2001) Ethnicize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Mobility Patterns among Owners of Small- and Medium-Scale Businesses. *Modern China* 27(3): 328-358.

Warren, John Robert (1996)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mong White and Mexican-Origin Adolescents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 1990.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9(2): 142-158.

Zhou, Min (1997) Growing Up American: The Challenge Confronting Immigrant Children and Children of Immigra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63-95.

Zhou, Min and Carl L. Bankston III (1994)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dapta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Case of Vietnamese Youth in New Orlea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8(4): 821-845.

## 繞道，豈是遠行？

陳婉琪

我只能說，這是一條偶然的岔路。

在那個巨觀結構的社會力洶湧澎湃、而我渺小的個人生命卻深處迷茫大海的時代，感受到社會科學致命的吸引力，並非完全的偶然或無跡可尋；選擇專攻領域，以及決定博士論文方向，也在還算有清楚問題意識的狀態下進行。原初最關切的學術話題——現代國家教育體系之形成，及其作為一個大型篩選機制對人的影響——使得我將關注的焦點環繞於結構效應、制度設計，以及制度所鑲嵌於其中的社會脈絡。關於族群的話題，我未曾想過要去碰觸，更遑論冒著遭受如是懷疑的風險：「談它，就隱含了做出分野的企圖」。

族群或省籍，在我的生命歷程中原本只是零散、個別的故事；他人的、自己的，各自漂盪在歷史的洪流當中，看似平行孤立，又似糾纏交織。然而，隨著生命經驗的累積，我逐漸深刻體會到歷史事件——不論是過往的或是當代的——之於個人及其人際互動隱晦而巨大的影響；對於卑微渺小的個人而言，一個帶著某種程度必然性的因果循環，卻可能是日常生活（乃至人生）的一切。我不禁想問：我，我的父母，我身邊的朋友，究竟走過了什麼樣的路？留下了什麼樣的足跡？

埋藏在幽暗記憶裡的，或是當下鮮活經驗中的大小生命事件，都曾深深觸動我的感受；在這同時，我在博士論文（台灣教育階層化長期趨勢分析）的資料處理過程中，偶然發現了外省族群，作為一個受歷史命運左右、處境極為特殊的新移民群體，展現了相當的獨特性；尤其在同時考量階級與性別等基本面向之時，複雜度油然而生，無法不脫離原先設想的論文架構而獨立探究。於是，我回過頭來搜尋文獻，重新提問。

就這樣，這兩種非常不同的原因，相互交錯而促成了這份研究。然而，如果不是奠基於學術前輩們的研究成果，它不可能這麼快的成為獨立篇章。

生活，從不是單一面向；這裡的發現，似乎也為這一段小小的研究歷程下了註腳：偶然的岔路，或許也隱藏著些許必然。